

费孝通

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变迁

李友梅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Fei Xiaotong

and Chinese Social Changes in the 20th Century

by Li Youmei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费孝通

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变迁

李友梅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Fei Xiaotong

and Chinese Social Changes in the 20th Century

by Li Youmei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李友梅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5.10
ISBN 7-81058-926-1

I. 费 ... II. 李 ... III. 费孝通 (1910~2005)—
思想评论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23828号

责任编辑: 尤红斌
责任印制: 梁临川

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

李友梅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2.25 字数 141 千

2005年10月第一版 200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1058-926-1/K·003

定价: 23.00 元

引 子

这是一个“对话”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介入各种形式的对话，扮演着不同角色的对话者。对话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流方式，它还是思维方式和阐释方式。我们在这里要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场特殊的对话，它是对一种思想的解读，更是对一种精神的追思。

还在费先生生病入院前，我们即已筹划好要和费先生进行一次访谈。想让费先生以这样一种比较自由的形式回顾他一生的思想历程，勾画出他的精神自画像。未曾料想，费先生入院后身体极度虚弱，以致无法言谈。费先生的离去使这次未能成行的访谈终成无法弥补的憾事。感伤之余我们也不禁想到，费先生一生勤思笃行，几十年风雨兼程写就了一部厚重的人生之书，它为我们和费先生进行深入的思想对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在这里和费先生进行的思想对话，着重于还原费先生各个时期思想生成的社会背景和学理来源，力求在展现费先生思想原貌的同时品味其独特的时代性内涵，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坐标中解读费先生思想的现实意义。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步阶段，学术界的很多相关理论和方法都是直接来源于国外。费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没有亦步亦趋地照搬国外的理论，而是选择性地借鉴一些国外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从中国的社会实情入手，致力于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探究总体性的社会变迁，开创了社会学的中国化道路，为中国社会

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费先生在早期研究中立足于大量的社区实地调查,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究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种种成因,并力求为困苦中的中国农民找到解除“饥饿”困境的可行性道路。从这时起,“富民”的宏愿便开始在费先生的心中植根,而“志在富民”更成为费先生一生的学术理想,它也是我们解读费先生一生思想的核心要旨。费先生从农村民生凋敝、文化颓败这一社会表象入手,通过这一时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制度束缚了农村人口的全部活力,使整个文化陷于僵化,而要使情况有所改观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土地关系。费先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发展起能够惠及农村的工业,而建立分散的合作化乡村工业无疑是最为可行的。正是从此时开始,费先生不仅确定了自己一生的研究方向,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即把田野调查与理论总结相结合,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理论,再以理论来为实践做出阐释。此种研究方式堪称开一代风气之先。

30年后,中国乡镇企业的萌生证实了费先生先前的设想,这股自下而上的发展趋势更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起来,费先生把乡镇企业称为“草根工业”,他认为,这种独特的工业形式生发于中国的乡土民间,有着极大的生命力。今天,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更加有力地证明,费先生为中国农村发展指出的路径是行之有效的。费先生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此,他把目光放在了更远处,看到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对城乡格局的诸多影响,并据此提出了“小城镇”的相关理论构想。费先生指出,工业下乡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繁荣,而乡镇企业的群落化发展则推动

了小城镇的复兴。小城镇不仅可以进一步带动其周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中国农民的生活质量,更可以成为体制改革中新旧力量交接的缓冲地带,费先生形象地称之为“蓄水池”。费先生认为,这个“蓄水池”能够突破原有计划体制的一元格局,为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提供交融空间,还能调节城乡人口的流动,缓解因人口过于集中而给城市造成的种种压力。我们今天看来,小城镇之所以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关键在于它把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力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生产力,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土地对劳力的吸附,费先生在这一课题上又延续了30年代对土地与人之间关系变动的研究。从这里可以看出,费先生的思索在时代的进程中一刻也未曾停歇,充分体现了费先生与时俱进的学术精神。

小城镇的发展使费先生看到了一种生动的集体组织模式,他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每一种模式都带有很深的地区性烙印,以至于在全国形成了多个具有个性特征的经济发展区域。费先生认为,一个经济区域建构好“心”(发展中心)、“腹”(内部发展空间)、“口”(流通通道)等几个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得到发展,也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潜力和动力支持。在这里,费先生不仅归纳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更进一步指明了其完善和壮大的路径。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区域性经济都以它们的发展过程诠释了费先生的理论主张,印证了费先生的设想。从这些发展的区域放眼全国,费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局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可能使原有的地区差异愈益明显、地区间差距加大。为此,他又从寻找市场、寻找推动地区间的合作机制着手,寻求解决地区间发展差异的种种途径。培育西北地区经济中心,促进东西部地区共同繁荣;整合经济优势,以浦东开发区带动长三角经济区;重视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建设中部经济走廊……这些就都是费先生基

于对全国经济发展格局的思考而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构想,他的“志在富民”的学术宗旨已经渗透到每一处思索中,在“行行重行行”的探索道路上化作了强国的良策。

费先生在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他在早年的《乡土中国》中便阐释了中国文化的乡土情结,并从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模式中总结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以为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初步解说。费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是以个体为中心,个体又将其人际关系向外无限延展而形成的。这一观点为费先生后来提出的“文化自觉”埋下了伏笔。费先生后来又将这一“差序格局”的概念引入对异质文化交往、文化继替以及社会交往中的主体心性等方面的阐释中,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多种文化现象的钥匙。费先生在晚年越来越关注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他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单位构成的民族实体,它的内部有多元化的文化组成成分,但却拥有一体化的总体格局。推而广之,整个世界也是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统一体。我们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有了这种意识才能求得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费先生在《东方时空》的访谈中说:我只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要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希望;自己十亿人希望的道路,中国要自己走,要自主,要文化自主。这就是费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进而,费先生又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提炼出“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以促进多种文化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就其实质而言,费先生在这里也为我们提出了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设想,因而这一主张具有极其深厚的现实意义。

回顾费先生的思想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费先生的治学风范和精神气质集中体现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和时代理想。

费先生曾说：“如果把自己的一生看成一篇文章的话，怎样结尾还是值得好好想一想。但‘费孝通’这篇文章怎么结尾，恐怕不是个人定位，而是时代定位的。”费先生思想的所有内涵必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显露其卓然的现实意义，而我们也会在与费先生的思想对话中获得无尽的动力，在费先生精神的感召下奋力前行。

目 录

一 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乡村社区的研究

——农村经济变迁、工业下乡与饥饿农民的出路 1

(一) 革命与现代化受挫背景下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

农村危机 2

1. 特定时代背景下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的双重

要求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迁 2

2. 农村与农民的困境 5

3. 挽救“危亡”的努力与危机的日益深重 7

(二) 理解社会变迁才能“救亡图存” 9

1. 以强国之心和富国之愿寻找国家和民族的

内在生命力 9

2. “文化”作为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工具 11

3. 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13

(三) “社区研究”——在“田野调查”中探寻社会变迁的

动力 17

1. 社区调查与类型研究 17

2. 对农村经济衰败的社会结构分析 21

(四) 工业下乡与中国乡村经济变革的出路 25

1. 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中国工业的发达 25

2. 工业下乡与中国式工业化道路 26

3. 工业下乡与农村合作化工业的发展 30

二 中国小城镇理论

- “蓄水池”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 34
- (一) 重启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35
 - 1. 中国模式的现代化与农业化和农村的发展 35
 - 2. 工业下乡、发展小城镇与中国模式的现代化 39
 - 3. 现代化以农民富裕和农村城市化为依归 44
- (二) 小城镇——大问题 45
 - 1. 亟待解决的社会困境——生产性社会与社会空间的一元化 46
 - 2. 小城镇是突破一元计划空间、繁荣农村经济的有效载体 50
 - 3. 小城镇是调节城乡人口的“蓄水库” 55
- (三) 中国农村经济的普遍繁荣与小城镇兴起的动力 59
 - 1. 工业下乡与小城镇的发展 59
 - 2. 寻找小城镇复兴与发展的动力 62
 - 3. 找寻中国农村经济繁荣的“模式” 68

三 对中国区域发展的研究

- 把握市场机制、促进区域合作、走向共同富裕 76
- (一) 从把握“市场”进入区域发展的研究课题 77
 - 1. 在计划体系中认识“市场” 78
 - 2. 理解市场体制 82
 - 3. 把握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 87
 - 4. 衔接“两张皮”——关注农民在市场中的能力获得 90
- (二) 寻找市场、为边区发展谋出路 95
 - 1. 探索走向富裕的“内发性机制” 95

2. 寻找推动发展的外力——合作机制	100
(三) 区域发展与“全国一盘棋”	105
1. 市场作为区域发展的“发动机”	105
2. “全国一盘棋”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	109
四 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变迁	
——“差序格局”与“文化自觉”	115
(一) 形成认识社会结构的分析纬度	116
1. 从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争论中获得的 启示	116
2. 回到涂尔干	118
(二) 乡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121
(三) 中华民族与全球性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127
1. 中国社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27
2. 世界一体与文化多元	132
(四) 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华文化的定位	135
1. 社会实体与人之本位	136
2. “差序格局”与中国的社会结构	140
3. 新世纪中华文化的定位	146
五 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	
——兼谈知识分子的“正气”与“志气”	149
(一) 社区研究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150
1. 社会学走入中国	150
2. 社会学的中国时期	152
3. 乱世中的中国社区研究	155
(二) “从实求知”与“学以致用”	
——学科建设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服务于时代的	

目 录

发展	161
1. 在学科重建中确立学科发展方向	161
2. 在实践中确立研究方向	164
3. 随社会发展更新思维	168
(三) 但开风气不为师	
——学术反思与学科突破,“富民”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	172
1. “破题开路”	172
2. “补课”与“扣门”	175
3. 开一代风气	178

CONTENTS

一 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 乡村社区的研究

——农村经济变迁、工业下乡与 饥饿农民的出路

费先生多次提到：“我这一生有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它是从我学术工作中产生的，我的学术工作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是以农村调查开始的”，（1995 年，“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一文），“40 年代前期，是对于农村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认识，然后进入我以江村为主的农村调查。接着从农村调查基础上申引出小城镇调查。”（《费孝通文集》第 11 卷，第 89 页。以下引《费孝通文集》，径称卷次及页次。）

20 世纪 40 年代前期，费先生在学习与不断深入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概念，形成了以农村为基础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费先生发现，中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实现以农村为基础的社会变迁问题，是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饥饿的问题。

费先生曾说：“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先生所说的“农民的饥饿”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挨饿问题。费先生把视野放在国际化的宏大背景下，即是说，处于西方列强控制下的中国没有能力应对西方工商业对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侵

蚀：“对于没有组织起来的自营小手工业者（petty owner-workers）的大众来说，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无论他们如何技艺娴熟，他们是与机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但他们必须坚持斗争，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将无法生存。结果是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农业国，纯粹而又简单，而一个农业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饥饿的中国。”（第2卷，第423页）费先生发现，中国可能成为一个“饥饿的中国”。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由此，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才变得至关重要。与其盲目乐观地迎接现代化的到来，与其盲目地抛弃一切旧传统，不如切实深入到农村中，为已被无情地抛入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寻找一条可行的希望之路。

通过解读费先生的思想我们可以明了，费先生是怎样为中国农民寻找希望之路的，又是怎样努力实现“富民”这一宏愿的。

（一）革命与现代化受挫背景下20世纪 30年代中国的农村危机

1. 特定时代背景下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的双重要求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迁

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还是一个自成一体、自我平衡与循环的文明体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枪炮一点一点地轰开了中国的一个个门户。从此，中国开始了由一个自为的文明体系向自觉的文明体系转化的过程，逐渐被纳入世界体系、被纳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一现代化发展取向的选择由一再发生的主权危机所引发，同时又因为主权危机的威胁与革命的不断发生而一再受挫。

鸦片战争时，朝野上下深受刺激，林则徐、魏源等人倡导学习

一 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社区的研究

西方“船坚炮利”的技术及相应的制度,以实现民族的自强。鸦片战争后,朝野习于苟安,对战争失败的教训也逐渐忘怀。林、魏等的言论也不再有人留意。左宗棠在《重刊海国图志序文》中说道:“书成,魏子歿,二十年,事局如故。”英法联军的枪炮直入北京,给了朝野更深的刺激,加以太平军的蔓延,满清政权摇摇欲坠,国家民族出现生存危机。由此,一场由部分在朝官僚发起的自强运动兴起并延续到甲午战争前。这次运动主要涉及与国防有关的轮船、枪炮、交通、矿业等事业,也包括纺织等少数民生工业。洋务派提出的发展目标也在于掌握西洋“船坚炮利”的先进技术。这次洋务运动以甲午战争的惨败告终。国家与民族生存危机的再次凸显使部分知识精英强烈地意识到,国家的强大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更需要先进的制度。于是维新派以改良的方式提出了政治制度改革方案,而维新运动的失败使得更多新式知识分子的情绪更加激进。此后,不仅满清政权成为革命的对象,中国传统的文化与价值理念都成为革命的对象。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要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以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使中国从困境中走向复兴。

作为自成一体的文明体系,若不是列强入侵改变了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并对文明体系的生存构成威胁,即使出现起义与社会危机,中国社会是可以通过皇朝更替实现文明体系的自我修复的。然而,鸦片战争后的国际形势打断了可能的循环,被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开始面临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剧变。

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是极其分散的小农经济。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农村依靠强化耕作方法、种植经济作物以及家庭手工业维持着经济的自我平衡。出售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获得副业收入是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关键性原因,不仅费先生在自

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

一 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社区的研究

己的研究中指出了这一点,后来黄宗智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以棉纺织业为例,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进口棉纺织品的急剧增长,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解体。据估计,1894年中国农村的手工棉纺织户比1860年少了约140余万户。那些手织业与农业尚未完全分离的农户,他们的织布生产也有近四分之一不是从原料到消费品都自我完成,即全部由自己播种、纺纱和织成布,而是从市场上买回棉纱织成布,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布生产环节已有近四分之一的部分脱离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页)在大批廉价洋纱洋布进口的挤压下,非商品性小农家庭棉纺织业,逐渐放弃自给自足性质的生产方式,与市场发生了联系。另一种属于商品生产的城乡手工业棉纺织业,一部分由于抵挡不住洋纱洋布竞销而沦于衰败,另有相当多的则通过变更原料来源维持生产。(这是一个商品生产不断扩大、现代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仅就此而言,中国似乎可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如费先生后来指出的,中国是有可能走自己的道路,可以避免其他社会在现代化早期劳动力大量外流造成的破坏。然而,这时的中国外患威胁不断。)

农业经济衰落但未被现代化经济体制取代,此前在困难时期,中国社会以自给自足、合作式的家庭和村庄手工业、副业自我救助与平衡,但此时,自然灾害和农村经济的崩溃使无土农民和失业人数猛增。维新思想家曾用“失业之人,如恒河之沙”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状况。这是维新时期,此后这一问题更加严重。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的发展刺激乡村人口的过度迁移,社会流动性剧增。于是农民大量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或者成为职业士兵;农村中另一些人则沦为土匪或流氓,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处于流

动、动荡环境中的农民、流民成为农民运动、工人罢工运动的重要生力军。

外敌的入侵很难说与中国的工业化以及早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何直接关系。但是,它刺激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分化以及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二元对立,同时,也推动了社会多样性的出现。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和新学的兴起,新兴的士绅力量出现。这一新生力量与传统的官僚阶层形成对立,后者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一新生力量肩负着启蒙的使命,成为社会运动的发起者与主要参与者。同时,工业化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组织商会,推动着国内民主化运动的展开。

更重要的是,它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与战争状态。不敌列强的事实使中国处于生存危机中,对国家统一、独立和强大,对现代化(包括现代工业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强烈渴望使民众在思想和行动上团结和统一起来。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立即明确的目标,被动员起来的社会不同阶层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革命成为统一认识的路径。维新变法失败后,革命形势与社会的分裂相互推进着,辛亥革命最终以激进的革命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形态上的选择问题。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走上了以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发展道路,此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主、科学的大旗下,同样以带有革命意味的激进方式批判和否定了可能抗拒和纠缠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传统政治文明中的价值体系。渴望民族强大、富裕,渴望个人解放、社会平等,然而,社会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陷入更大的分裂与动荡中。

2. 农村与农民的困境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稍后便波及了中国,对中国